

民国体育场忆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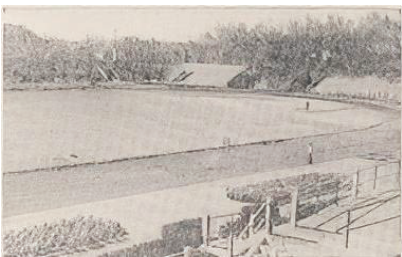
高艳华

初冬的一个周末,我又带着孙儿大桐来到民国广场。大桐出生时,这片场地刚改造完不久——他在这里学会走路,坐着观光马车听导游讲五大道故事;现在,作为一名北京小学生,每次回天津,他总要在儿玩到尽兴。

民国广场的前身民国体育场曾是天津最大的体育场,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升级改造,2012年至2014年完成脱胎换骨的重建,变身为集健身、观光、餐饮、购物、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休闲广场。场地无封闭围墙,吸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天津人念旧,老土著仍习惯叫它“民国体育场”。

● 上世纪中期的成长往事

民国体育场地处和平区,上世纪初被英租界爱丁堡道(今重庆道)、马耳他道(今衡阳路)、新加坡道(今大理道)、威灵顿道(今河北路)四条路部分路段围拢起来。在我少年时(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除正门外,四个交叉路口各有两扇对开的高大庄重的红门;三四层楼高的围墙圈起的看台,能容纳约两万名观众,那时天津还属河北省管辖,省市许多体育大赛都在这里举办。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民国体育场一角

体育场正门斜对面是长沙路。出此门,顺直走到耀华中学,全程不到1公里。我家就在长沙路四品香旁边,从体育场正门左手边往鸿德里走,先经过民国大楼、和平第11幼园、长沙路小学(现址已是11幼),横过成都道后,再穿过永安里,就是鸿德里。鸿德里左手第一门的房产,现仍属于101岁的老寿星唐婧;90年前,她的公公唐鸿宾先生见五大道已成规模,便在那一年开始建鸿德里。开工那天,他兴奋留影,照片上清晰记录下:“乙亥除夕前一日余初翼簪于时年五十一岁,越二十七日始建筑天津英租界鸿德里楼房亲自持锨动工典礼摄影留念 唐鸿宾 识 丙子正月二十七日”。当年鸿德里与永安里、思治里本是相互呼应的建筑群,唐先生协调施工。

上世纪60年代初,长沙路小学和西安道一小、二小,以及我1962年入学的营口桥小学(校址在今耀华中学校内),四所学校的房龄尚在“青春”。建筑美如画,崭新的书桌、新安装的玻璃黑板和明亮的教室,至今难以忘记。鸿德里总是安安静静,九方格地铺就的地面永远干干净净。这一切,让我和小伙伴们的童年像花儿一样温馨美好。

民国体育场的环形大台阶就是看台,有二十几层,每层约两尺高,一尘不染。看台十分宽敞,坐下来,双腿放在前一排人背后,还有很大的余地,不会碰到对方后背。天冷时台阶冰凉,到了夏天又晒得滚烫,我姐曾在一个夏天参加组字表演,当时多所中学在这里集训,学生们热情似火,没有人因为天气热而叫苦叫累。

天津一中老学长张鸿德,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前,他就拍下了鸿德里的照片,还珍藏着自己从小学到高中在民国体育场留下的时光印记:有参加短跑、中距离跑、跳远的夺冠照片,有运动会剪报,还有天津市体委、河北省体委乃至国家体委颁发的

的比赛奖章、奖状、运动员等级证书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国体育场周日常举办球赛,那会儿观赛球迷的自行车长龙很是壮观,从耀华中学那边过来600步,右手从求志里(大革命时期中共天津地委办公地之一,当代作家何申曾住在这里)开始排,依次经过冯骥才先生当年住的思治里和相连的长沙路幼儿园,研制“通脉养心丸”的名中医董晓初居住的鸿德里、鸿德里旁边永安里两条胡同,以及对面的九福里和瑞玮山庄,100多米长的路两侧整整齐齐地排满自行车,足有上千辆,多到把我家设在长沙路上的前门都堵住了。那会儿也没听说过球迷丢车的事。

鸿德里的邻居开着窗户,民国体育场里“进球了”的欢呼声能把整个胡同唤醒。邻居陈哥和我姐还记得,曾有阿尔巴尼亚足球队、朝鲜鸭绿江足球队与天津队在此比赛,陈哥清楚地记得鸭绿江队与天津队的比分是1:1。张鸿德学长说1965年前的球票从1角到1元不等,按看台方位细分;陈哥则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球票一个价格,不分座位等级,位置好不好全看买票早不早,当时花两毛钱就可以观看一场高水平的酣畅淋漓的球赛。那时的民国体育场,不只是比赛场地,更承载着天津整座城市的激情与梦想。陈哥记得上世纪60年代天津足球队的主力球员有张业富、宋恩牧、孙霞丰、张亚男、韩武……我知道国家队守门员张俊秀住长沙路桐华里,却从没见过,据说他后来调到国家体委,成了年维泗的助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民国体育场里盖满临时抗震房,以后没有赛事;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经常举行大型公开的非体育类活动。这些都成了五大道周边居民抹不去的记忆。

● 上世纪末的足球印记

10多年前在多伦多一家银行,一个年轻的男储蓄员笑着跟我打招呼:“阿姨,多年没见,‘于根伟’后来上大学了吧?现在在哪儿工作?”我愣了愣,终于想起他是与我儿子小时候一起踢球的邻居小伙伴。

上世纪90年代,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儿子也成了小球迷。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对着电视直播预判解说员的用词;高中时把自己写的世界杯足球赛征文送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当晚的体育节目就播出了这篇文章,成为他青春岁月的美好印记。

那些日子里,儿子把邻居家的小伙伴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小朋友们问他叫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于根伟”。那些年,他的记录本上满是足球教练员、解说员和运动员的签名:蔺新江、高复祥、金志扬、张路,等等,当然还有真正的于根伟。天津足球队领队刘作云的爱人,是鸿德里的老邻居苏杭,我常幸运地得到这对夫妇的赠票。

1996年,天津三星足球队主场对广州松日队的比赛,是令我们母子最难忘的一场足球赛。多年后儿子跟我说:“1995年天津队没外援,1996年奥斯瓦尔多来了,下半赛季左树声上任,又换了三个巴西外援。邵庚那次连过五人进球,那可是甲A历史上的最佳进球之一,



上世纪90年代末民国体育场内的运动场景

在当时的情境中,其他在场的人物作为情节的真实参与者,反而很容易理解成王太医的所谓“不敢”是说贾母不敢去拆,这就使得“不敢”不再是基于王太医自己的立场,而是针对贾母而言了,“不敢”的主体被偷换,也就产生了幽默的效果——对话就在生活化之中,显得更加趣味横生,就不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前言后语。

当然,如果还原王太医说话的情态,他也有可能是间歇式地说了两次“不敢”,第一次听说宝玉要给他送礼磕头,连忙说“不敢”;第二次人家贾母都换了语气,他没听清,还是惯性地说不敢”,这就比贾母一段话全说完,他一口气说一句“不敢,不敢”要显得更有情趣,看上去像是小品演员扮演一个又诚又憨、反应迟钝的角色。

贾母在叮嘱王太医时,宝玉仍在发病,尚未安静下来,则可知她内心仍焦虑、态度仍急迫,所以,她说的这句“拆了太医院大堂”,虽是“戏语”,却不能完全当作玩笑话,多多少少是借老太太略带严肃口吻的告诫。而王太医的回答,则如同不走心的条件反射。文本的叙述,把王太医的回答安排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打岔”,这就使得紧张的情节得到了戏剧性的调节,荒诞性的紧张在玩笑式的破绽一笑中得到初步化解。

曹雪芹的叙述之笔实在是曲尽形容。人们常说他的文笔妙在真实,但真实也会有肤浅和深刻、平淡和曲折的区别。这样小的对话细节,他都没有放过增色的机会,在片刻间给读者一些意外的感觉,也给读者一个停下来反应一会儿儿子又跟着情节哑然失笑的机会,可见他语言处理的精微,这才是“高级的真实”。

像这样不起眼的闲文,多写一个或少写一个又有什么区别呢?但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我们阅读《红楼梦》的趣味所在。我们毕竟是在读一部作为小说的文学作品,首先要看到的是它的文学性,以及其中既真实又不太容易随便想出来的人情百态。我们也从这样的例子中更加感受到,这样一部大书的波澜起伏,节奏抑扬,不仅仅是取决于主要人物的言行,那些看似微末的局部,也起到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

咱们能亲眼看到,太幸运了。”他还回忆道,“看那场球咱俩坐在民国体育场14看台,就在主席台右边,出来就能看见外援。奥斯瓦尔多那场头破了,缠着绷带还坚持踢完,救护车都来了。您当时跑在追星族最前面,速度快得很,把奥斯瓦尔多都看呆了——现在想,他肯定纳闷儿,这天津40多岁的中年女球迷真厉害!”

那段日子,我写了篇几百字的文章《球迷的奇迹》,表达看球时气血顺畅的快乐。我贴了张两毛钱的邮票,把稿子寄给了《天津日报》。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处理我稿件的是编辑郑莱,我不知道她的模样,连句“谢谢”都没说,成了永久的遗憾。后来,我总以她为榜样,认真修改作者的稿件,尽心尽力地为他人作嫁衣。

那几年,还有两段发生在民国体育场的插曲令我难忘。有一场比赛太热门,进场管理严格,一张票只能一个人进去,不能带孩子。我只好让自己自己进场,反复叮嘱他:“别去拥挤的地方,散场时等会儿再出来,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的唠叨被一位执勤的武警排长听到了,他上一个战士追上我:“大姐您别走,我们排长让您进场。”我感动地叫他们是哪支部队,战士只说“我们就是武警”,追问了半天,终于告诉我排长姓邢及其联系方式。

进场后,我找到主席台,请播音员帮忙找儿子。不一会儿,儿子远远地冲我跑过来,欣喜的目光里似乎在问:“您怎么进来的?”

当晚,我就试着给邢排长写了封感谢信。他接到信后给我打来电话。后来他还来我单位找过我,说他特别崇拜周总理,立志要做总理那样的人。他是大学毕业后参军成为一名武警战士,的那天在体育场听到我跟孩子的对话,想起每次离家时母亲对他的嘱托,差点儿落泪。

那时因为爱足球,我特别关注北京国安队,也喜欢听时任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先生的解说。找他聊足球成了我组稿的敲门砖。我根据他的口述,执笔写了《我曾住在黄土高坡》一文,得到了他的热情肯定,这篇文章还被收录到《知青老照片》一书里。

● 进入新世纪后的情感联结

进入新世纪后,因种种原因,我对足球的热情渐渐淡化,可与民国体育场的情感联结还在延展。

2008年,一个叫布莱恩·鲍尔的英国人进入我的视野。他1918年出生在天津,童年时期住咪哆士道(今泰安道),1930年搬到了爱丁堡堡道(今重庆道)——那时的爱丁堡堡道刚建好,鲍尔满心欢喜地随父母搬进了新家。我编写的《散落的珍珠》一书,竟被他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了。他按照版权页上的信息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帮他找几本他在天津出版的书——《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可他手头没有这本书,连出版社和编辑的名字都忘了。

了解情况后,我找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韩玉霞。韩老师特别热心,很快就寄了书,满足了鲍尔的心愿。鲍尔特意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感谢。在书中他回忆,1930年5月24日值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12岁的鲍尔在民国体育场参加了纪念女王的校际运动会,还与老师、同学等拍了合影;他记得那时体育场的跑道是煤渣儿铺的,也记得英国人伍海德常常自豪地说:“在世界任何地方举办的庆祝活动,都不如天津办得热闹。”他还提到当年民国体育场的管理者是俄国人,叫尼科庭。可谁知,或许是心愿已了,鲍尔收到书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如今,我儿子也已人到中年,经常抽时间观看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尤其天津津门虎与北京国安的比赛,常到现场加油助威;他平时也爱踢足球,2025年还参加了北京市第五届社区杯足球赛。孙子大桐课余时间也爱踢足球。我们一家与足球的缘分还在继续。

民国体育场,留下了往日时光中的点点滴滴,一生难忘。

题图摄影:记者 吴迪

满庭芳

第五四一八期

家有四屋,两间为书房,夫妇二人各居其一。一间我的,满室简单清新的松木橱与桌,明亮而温暖。工作家务之余,我就在这里读书写作。另一间,四壁落白,只有老榆木的一桌一椅,先生但有闲暇,必在此临帖练字。日常生活恬淡而知足。

拥有一间专属书房,是从古至今每个读书人的愿望。能在翰墨香气中读书练字,沉淀心灵,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情。

在古代,书房是文人骚客的安身立命之所。虽然各自经济情况迥异,但书房内里却无一不精心设置,追求高雅别致,有独特的文化氛围。在这个小天地里读书、吟诗、弹琴、作画、品茶、对弈,书房俨然是文人的精神家园。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对自己那间简陋的书房爱之甚切,坦然道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何陋之有?

中国读书人讲究雅静修身,为书房须有清雅特质。文人的清闲雅致决定了书房拒绝一切富丽装饰。即便是富贵宦官人家,也只讲究低调的奢华。李渔《闲情偶寄》中写道:“书

京剧艺术大师荀慧生生于1900年1月5日,仙逝于1968年12月26日。每届岁尾年初,天津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紫苓的心情总是不平静,总是更加思念恩师,已然寿高93岁的她仍念念不忘恩师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诲。

王紫苓第一次赴京拜见荀先生,是跟随引她步入京剧之门的魏效荀(荀先生弟子)老师,那是1946年初,她刚满13岁。要拜见艺坛大角儿,小紫苓心里着实紧张。不想,一进门就见到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荀先生上下打量小紫苓,笑着说:“这孩子要扮上,得多漂亮!样子很机灵,来,吊一段儿我听听。”马上让琴师郎富润给紫苓吊了一段《铁弓缘》。荀先生一边拍板,一边笑着仔细听,边点头边说:“好,真有点儿我的味儿呐!我收下这个徒弟吧。”紫苓一高兴,也不紧张了,用手捂着嘴,舒心地笑起来。荀先生高兴地说:“嘿,脸上还挺有戏呐,真是花旦坯子!”接着又冲魏效荀说,“她还小,离我又远,你可得好好儿教她啊!”紫苓正式拜入荀门。

晚上,师徒二人同桌吃饭,见荀先生几乎没吃什么,只喝了两杯白酒,紫苓双手奉上一碗饭。荀先生笑了:“今晚有戏,不能多吃。这叫饱吹饿唱,记住啊!”饭后,荀先生牵着紫苓的手,到鲜鱼口胡同内的华乐戏院去演出。在马上上,荀先生叮嘱紫苓:“在天津你吃什么饭呐?”紫苓因为平素说天津话,不好意思张口。荀先生操着天津话说:“贴饼子熬小鱼儿,您啦!”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又叮嘱道,“要想唱戏,先学北京话,不然,一张嘴一口天津话可不成!知道吗?”紫苓频频点头,望着老师和善的面孔,心想这么大的角儿,一点架子也没有,多好哇,我长大了当了角儿,也学老师不摆架子。当晚,荀先生演《十娘》,这场戏给紫苓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荀先生缠绵凄楚的唱腔、哀怨悲愤的表演,以及那独特的服装——圆襟小短袄,肥袖口,上面镶着一圈荷叶褶儿,都令小紫苓着迷不已。

后来,王紫苓成角儿挑班,虽演出繁忙,但还是时常到荀家请益。荀先生极喜欢这个徒弟,1959年到天津剧协讲课,特意把王紫苓叫到身边,不厌其烦地教授《杜十娘》“投江”身段。1960年,荀先生偕夫人张伟君专程来中国大戏院看王紫苓的《大英英烈》,散戏后到后台给全体演职员“道辛苦”,对大家说:“这出戏可是我的拿手戏,紫苓演得好,很像我!”又拍着王紫苓的头说,“是荀派!是我的味儿!”转头师生见面,荀先生没有闲心聊家长里短,立即讲戏情戏理:“演戏要演人物,千万别为唱而唱,为做而做,要通过唱和做把人物表现出来,表演一定要含蓄、深沉,不要过火。拿你的眼睛来说,含着过火了,太活,显得乱,太多,显得贫。以后记住,眼睛要用准,用俏!”荀先生一边讲一边用眼神儿给王紫苓示范。接着,又说起了《金玉奴》《玉堂春》《红楼二尤》等戏。

光阴荏苒,几经磨难,王紫苓成长为享誉全国的京剧大家,越是学习荀派,越是演出荀派戏,她愈发觉得荀先生为京剧花旦的唱、念、做、打,开辟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荀先生敦厚的人、温和的性情,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及对她的谆谆教导,永远铭刻在王紫苓心中,即便荀师仙逝多年,这份感情在她心里从未变淡。

为致敬、缅怀荀慧生这位艺术大师,1983年1月、27日至2月5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在津联合举办了荀派艺术演出专场,连唱十天。荀夫人张伟君特意携女荀苓来从北京赶来,并邀约全国多位荀门弟子参演。这样一次阵容齐整、名家云集的活动,既是艺术大比拼,又是展示个人风采的绝佳机会。年已百岁的王紫苓想:“既然是纪念恩师,几个师兄妹聚在一起,就应当互相切磋、学习、团结,把荀派艺术传承好、宣传好,把活动办得圆满满满,才不枉恩师教导一场!作为天津本地演员,我不该争名夺利,缺什么就来什么,安排我演哪场就演哪场!”面对来自各地的荀门名家,张伟君很是为出场顺序为难,王紫苓对她说:“来到天津了,您甭着急,先让师兄、师姐妹们挑。大家挑剩下的我唱!”

果然,十场演出王紫苓参演了八场,均是唱开场或演配角两场。两场《红娘》,她演“传书”;两场《金玉奴》,她演“豆汁记”;一场《红楼二尤》,她演尤三姐“听戏”。这三出大戏,王紫苓均演开场场戏,相当于“帽儿戏”,



刘万江

且均不是火爆、讨俏的桥段,但她从念白、眼神到身段,唱腔均一丝不苟,绝不“水着唱”,为后面场次的师姐师妹们表演这个人物奠定根基,保证整个戏的质量。1月31日迎来折子戏专场,王紫苓仍唱开场,按《悦来店》剧情,本来先是老家院和小生商议事情,为二十来分钟的碎场子,如此铺垫好,造足气氛,角儿十三妹再登台,可使角儿产生光彩夺目的舞台效果,此外,这折戏中十三妹还有一个漂亮的“趟马”身段可展示。王紫苓考虑到她后面还有两个折子戏,万一时间拖延太晚,会影响后面名家们的演出效果,且最后一个折子戏《姑嫂英雄》中,来自南京的师妹董金凤也有一个“趟马”身段,她前面如表演过于火爆,观众不再觉得新鲜,就会影响后面董师妹的舞台呈现。于是,王紫苓毅然掐掉这场戏中前面的碎场子,锣鼓一响她就登台,同时,“趟马”只趟了一半儿,把精彩身段留给后面的师妹表现。要知道,王紫苓幼年时打下的是刀马旦乃至武生的底子,“趟马”她可以走得让观众叫好儿“掀房盖儿”。可是,演出刚开始,还没等观众全到齐,台下还闹闹嚷嚷之际,她已经表演完下台了。不少观众深感遗憾:“我们还没看够,王紫苓就下台了!”京剧名家厉慧英、邓金昆等也万分感叹:“紫苓这艺德!”

演出最后一天,2月5日,仍是上演三个折子戏,荀苓开场主演《花田错》,饰演丫环春兰。剧中的小姐是戏班行话讲的“二路活儿”,角儿是不唱这个人物的。但小姐与丫环搭戏也很重要,荀苓来初次来津公演,为支持师妹,从未演过这个角色的王紫苓主动请缨,配演小姐。演出中,她不仅处处密切配合师妹的表演,处处“亮”师妹,还处处“兜”着师妹。在小姐、丫环上楼,关上门偷偷做计的表演中,荀苓来因初闯京剧重镇天津卫颇为紧张,竟忘记了关门的动作。后面尚有老夫人在上楼推门,见门关着,有暗谈灯光闪烁,于是敲门进屋查看等对话和表演,如不关门,则相当于出了舞台事故。王紫苓随机应变,轻声呼唤:“春兰,天儿不早了,你把门儿关上。”荀苓顺势做了关门动作,一场舞台事故在不动声色中巧妙化解。散戏后,张伟君来到后台,握住王紫苓的手感激不尽:“紫苓,我看到令莱忘了关门,吓出一身冷汗,你‘兜’得真好!这些天你辛苦了,又唱帽儿戏又演配角儿,你太是你师傅的徒弟了,太对得起你师父了!”

天津京剧团的相关负责人也说:“紫苓同志给咱们天津露脸了,闹了半天咱们团还拥有一个‘宝’呐!”通过这次活动,天津观众更是对王紫苓的艺术表演给予高度评价:“这次专场,就看董芷苓和王紫苓了!一南一北,‘荀派双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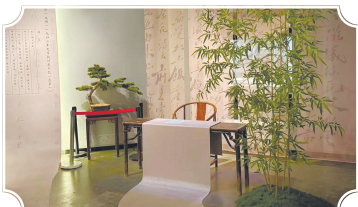
题图:1959年荀慧生与王紫苓合影留念

古时的读书人,一心埋头书案,沉浸在书里面。内心世界从容淡定,一片自然和乐,世间万物都不能进入他的意识。

而我,羡慕的是他的读书环境。杨花轻盈必是窗前树木成荫,瓦雀胆大必是无乱耳之音。

接近自然、远离尘嚣是文人书房最理想化的韵致。然自古及今,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于书房设置并没有形成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选室内一隅;你可雕梁画栋,我自环堵萧然。选择书房建筑的地点也没有特殊要求,可在河湖之滨,也可造于山谷林间;可于闹市取静,抑或隐于乡村。为达到接近自然,创建清雅周边环境的目的,文人们无不竭尽所能。或植以南山之竹,或覆以荆楚之茅,所为皆是要极富诗情画意,雅气洋溢,令人俗念尽忘。所谓:“市声不入耳,俗轨不至门。客至共坐,青山当户,流水在左,辄谈世事,便当以大白浮之。”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这样描述书斋外的环境:“窗外四壁,薛萝满墙,中列松松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墙,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真是雅到了极致。



古今文人书房梦

王霞

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石灰壁,磨使极光”为最佳,其次“则用纸糊”。所有的“宜简不宜繁”,皆力求“高雅脱俗之趣”。

文人为书斋起号,其实就是情与志的宣言,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袁枚的“小仓山房”,还有梁启超的“饮冰室”,等等。“好书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读圣贤书,香斋心;交知己友,友爱友情。人生之乐无外于此。

书房之内须雅而静,书房之外也必是清而雅。“双双瓦雀行书晓,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宋代学者叶采的《暮春即事》就描摹了这样一间置于清幽自然环境里的书房。十分宁静的书室,垂柳飞絮(杨花即柳絮)的季节,春风娇弱的日子,屋里似乎没人,几只麻雀悠闲自在地漫步在书桌上,柳絮轻盈地随风飘落,赖在砚台上不肯动弹,竟然无人拂拭。那位

沽上丛话